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

——纪念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60周年

顾海良

[摘要]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至今已经过去60年了。《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其所阐释的基本理论对于当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活力就在于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和需要,在于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的理论逻辑。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事实出发,不断弘扬和拓新《论十大关系》坚守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立场和思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序篇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03-0063-08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至今已经过去60年了;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也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岁月的风尘并没有褪去《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理论光辉,也没有减小《论十大关系》所具有的思想力量。回溯历史,如果说我们正在成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1]那么毛泽东当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序篇。以序篇相称,一方面是因为《论十大关系》发表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即将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转折时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论十大关系》作为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首创之作,所阐释的基本理论对于当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依然有着重要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最初成果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极不平凡的一年。

作者:顾海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年以来的变化时指出:“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他认为:“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2](p.1)}面对这些,“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3](pp.466-467)}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深切感受到,同“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新中国还一直沿用苏联既有的模式,毛泽东后来在回顾这六年发展的实际时提到:“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4](p.117)}从“心情格外舒畅”到“心情不舒畅”说明,毛泽东在满怀激情地期待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到来时,已经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等问题提上

了重要议程。对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成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面对的最为紧迫的课题。

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为准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开始连续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直到4月24日,实际听取汇报的时间长达43天。毛泽东的传记作者认为,“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3](p.471)}。一开始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对苏联的经验和道路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的问题。2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打破迷信”,“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5](p.537)}这里提出“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的思想,是毛泽东开始调研十多天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就在毛泽东得出这一结论的同一天,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5](p.545)}毛泽东这一分析,既揭示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根本错误,也明确了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3月13日之后的几天,毛泽东在继续听取农业、水利、林业和气象部门汇报的同时,也在深刻思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毛泽东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探索,同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急剧变化的形势和相关战略问题的思考结合在一起。3月2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谈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意见认为:“赫

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5](p.550)}毛泽东在再次谈到“揭了盖子”和“捅了娄子”的问题时,深刻地提出了三个新观点:一是要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不要“硬搬”苏联模式那一套,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三是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命题。

这次会议提出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4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4月4日,在最后一次讨论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时,毛泽东谈到:“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毛泽东“对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问题的回答就是:“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继续提到:“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毛泽东的结论就是:“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5](p.557)}

毛泽东关于“进行第二次结合”、“更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思以及现实思考的结果,过去我们“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靠的是“自己的独创”,取得不断的“胜利”;现在我们依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努力找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转折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后来肯定,《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pp.369-370)}也就是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6](p.419)}《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提出“第二次结合”重要思想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探索的最初重要成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重要探索,写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关系

《论十大关系》一开始,毛泽东就指出:提出“十大关系”或者说“十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基本方针”,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力量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毛泽东随即强调的:“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pp.23,24)}这一“基本方针”,实际上是理解和处理好“十大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对这一“基本

方针”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视角作了探讨。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2](p.1)}显然,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的,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解放”;“解放生产力”将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即为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条件”。不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这就是“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2](p.2)}这些基本观点,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发展成“基本方针”这一重要思想。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党的八大得到进一步阐发。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7](pp.350,341)}因此“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p.40)}对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判断,是与“基本方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本方针”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原则。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谈到“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问题时,明确地把“坚

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8]作为其中的两个方面的“重大原则”,并结合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作了新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序篇中的“基本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中获得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涵。

在《论十大关系》中,正是在“基本方针”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依次讲了“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大关系”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一体,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思想。但是,“十大关系”或“十大问题”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有重点的、有紧要的关系。毛泽东立足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凸显主要问题,在全局关系基础上把握重点关系,在解决重点关系中引导全局关系发展,在“十大关系”的辩证发展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在根本上,“十大关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2](p.28)}的总体思路下,核心问题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1956年4月19日,在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前一周,毛泽东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他认为:“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在这个问题上,“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同时,他也关注到,“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在谈到农业增产问题时,毛泽

东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骤要慎重,不能破坏了精耕细作。”他还提出:“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5](p.562)}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农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三大关系,是涉及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因而它们是“十大关系”全局中的重点关系、紧要关系,是处理好“十大关系”中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基础和根本。

第二天,毛泽东在继续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谈到:“除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5](p.562)}从三大关系到五大关系,增加了地方和中央关系、经济与国防关系。这五大关系都属于经济关系的范围。从“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的总体的高度来看,在“十大关系”中,经济关系是重点关系,是解决和处理其他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深刻指出了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的基础作用,也已经科学地把握了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对象进行阐释时,曾经提出“总体”方法论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全面性和重点性、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9](p.31)}在这一涵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在内的“总体”中,其各构成部分和要素并不是一种分离、并列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是“普照的光”;在经济关系中,“生产”、“生产关系”是“普照的光”。毛泽东论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凸显了经济关系在各方面关系中的“普照的光”的作用和地位;在经济关系中,凸显了最基本的物质生

产领域和过程的“普照的光”的作用和地位。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主题和兼顾原则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发展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以“从发展的观点看”^{[2](p.44)}为基本方法,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展问题的一些根本性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些基础性命题。

关于发展问题,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前的调研中,毛泽东已经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关系问题。2月14日,毛泽东在调研的第一天就提到:“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5](p.529)}毛泽东以发展为中心线索,对生产、积累、就业、消费和市场等关系作了阐释,突出了发展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毛泽东还强调,对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5](p.529)}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作用、保障作用等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理解的洞察力。

第二,关于发展中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问题。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城市建设总局汇报时,提出“城市要全面规划”的问题,认为城市的工业发展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等问题,要“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社会发展规律”。^{[5](p.535)}把握规律,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要以事物发展自身的条件为基础。2月25日,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时指出:“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

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他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是穷,二是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原因之二在于,与苏联当时发展的条件相比,我们发展的“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还有“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等一些特点。因此,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5](pp.536-537)}在毛泽东看来,“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重要的是,“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5](pp.539,540)}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合理的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第三,要“打破迷信”,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打破迷信”就是要破除旧有思想的束缚,抛弃不符合现实发展要求的成见陋习,不断解放思想。毛泽东在调研期间反复思考的是:“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2](p.17)}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是这样,经济实际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总有“一个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总会“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2](p.17)}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在对“十大关系”特别是对经济建设五个方面关系的探索中,“从发展的观点看”,既是毛泽东研究经济建设问题运用的主要方法,也是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立场。

在“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分析入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上,牢牢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问题。他指出:“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2](p.24)}根据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根据当

时产业结构调整的内要求,他强调:“我们现在的问題,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来看,确立这样的发展思路,“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地发展重工业”。^{[2](pp.24-25)}这样的发展路子显然适合于国民经济积累和消费关系、供给和需求关系调整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上,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作了探索。毛泽东认为,沿海和内地的工业经济布局还处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之中。因此,一方面“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毛泽东认为,区域经济整体布局上,“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在这一“逐渐平衡”的过程中,依然要坚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2](pp.25-26)}

在区域经济布局协调和发展中,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2](p.31)}在中国,发展的基础在“地方”、发展的动力在“地方”,发展的能量也在“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注意地方的利益”,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 and 发展的关键。

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p.41)}毛泽东特别提到:“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

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好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毛泽东告诫说:“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不仅对发展这一涉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核心问题作了阐释,而且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的原则问题作了阐释。“十大关系”也就是十大矛盾,毛泽东认为:“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2](p.44)}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矛盾”、“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兼顾”原则。

在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毛泽东认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2](p.28)}“兼顾”原则的根本就在于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物质利益关系。

毛泽东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2](p.34)}“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兼顾”原则就是,“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2](p.29)}同样,“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在这个问题上

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2](p.30)}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2](pp.30-31)}

四、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论十大关系》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0](p.190)}这一评价突出了《论十大关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中“初步总结”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的意义。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这一评价不仅一再得到强调而且还多有提升。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11](p.691)}习近平从“第二次结合”的高度,对《论十大关系》作出新的评价。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1]在这里,习近平对以《论十大关

系》为新起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精粹作了新的评价。这些评价说明,《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新的著作”的开拓之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探索中,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原则。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发展《论十大关系》倡导和遵循的这一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2](p.42)}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1]把《论十大关系》中“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融会贯通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之中,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践的学说,归根到底是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它的第一要义及其最根本的命题就是发展。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最关键的就是要赓续和拓展《论十大关系》倡导的“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方法和理念。毛泽东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就在于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在于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我们今天面对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习近平认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

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1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集中体现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11]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新的理论成就,体现了对《论十大关系》倡导的“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方法的赓续和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活力就在于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和需要,在于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的理论逻辑。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事实出发,不断弘扬和拓新《论十大关系》坚守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立场和思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就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写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就要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

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1]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
-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2.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1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5-11-04.

责任编辑:图 图

development trend of cultural industries, but also at grasping their dynamic mechanism so as to implement precautionary governance. In view of this, the win-win sol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ivilian cultural rights calls for a shift from traditional governance to modern and effective cultural governance.(Xie Xue-fang)

On Structure, Strategy and Mission as Three Dimensions for State Governance: Study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tate Governanc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modernizing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has been put on a political agenda for CPC's state governance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significant statements on theories of state governance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structure, strategy and mission. In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Four Comprehensives",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perception and development view of state governance is respectively embodied in realiz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China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ploring practices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studying Xi's statements about state governance are important contents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s for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Song Dao-lei)

On Improving Party Media's Competence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Improving the competence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s, recently put forward as a strategic assignment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a CPC work symposium for media and press, is a crucial responsibility assumed by CPC's press and media, whose key lies in the answering of two underlying issues, namely "whom to guide" and "how to guide".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recognize the subjects, relying power and strategie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by tak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object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the unification of media coverage and CPC leadership, and the convergence of subjective capacity and process capacity etc. On the basis of thei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CPC's press and media shall step up guidance chiefly on the elevation of its political stance that Party media speak for the Party, intuitively turn Party's advantages into media's edges, renovat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PC publication, and promote an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media. (Zou Han-yang and XiaoWei)

The Preface for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Mao's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It has been 60 years since Mao addressed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t the enlarged conference of CPC Political Bureau on April 25th,1956.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is a preface to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udimentary theoretical issues discussed still carr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writing a new chapter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vitalit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es in it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s well as in its integration with Chinese economic realities and accordingly developing into a theoretical logic for Chines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It is central for writing a new chapter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ase ourselves upon current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o persistently uphold and expand the Chinese-realities-based stand and thought firmly extolled in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Gu Hai-liang)

A Grand Green Dream and an Afforested Country: Reading *Mao Zedong's on Forestry*: Mao Zedong's thought on green economy has been fully demonstrated in his *Mao Zedong's on Forestry*. It is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carefully read the book and appreciate his thoughts on forestry. Since his youth, Mao Zedong has been keeping an eye on forestry. After establishing the new China, he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greening. He not only advo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husbandry and fisheries, but also emphasi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try afforestation. An overall comprehension of *Mao Zedong's on Forestry* suggests that its author is not only a red idealist to achieve communism in China, but also a green idealist to implement afforestation in China. Both focused on the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of people. In the book are a variety of important ideas or arguments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on, which is still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our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 Wei-xiong)

Upholding the Values in China Dream: A Review of Moral Dilemmas in Western Dream: The past glory of western dream is built on a rich material basis. Nowadays, western dream is confronted with great many moral dilemmas, represented as the insurmountable culprit of reified human under the full gratification of physiological needs, and the self-denial and self-divis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tates resulted from taking wealth as the only criterion, and the unbridgeable divergence between countries. Surpassing moral dilemmas rooted in western dream and sticking to the values extolled in Chinese Dream not only calls for further progress based on western material achievements, but also streamlining the realistic problems brought by biased material pursuit. We should cultivate a cultural realm of self-ego transcendence, map out visions for diligence and sharing, and construct a community of human's destiny characterized by internal bounds. (Xu Wei)

On the "One Road & One Belt" Proposal: A Perspective of Foreign Dignitaries, Scholars and Media: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One Road & One Belt" Proposal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number of overseas dignitaries, scholars and media respond actively by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Some comments are praise, support and anticipation, while others are misunderstanding, misreading and even hostility. Undoubtedly, comprehending all these views in a prompt and overall styl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Proposal. (Wu Su-xia)

(翻译:张剑锋)